

天才·狂人 與死亡之謎



貝多芬的頭髮，訴說了他創作巔峰後謎樣的死亡？

貝多芬

舒伯特

舒伯特、舒曼的抒情樂章譜寫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楚？

梵谷生如烈焰，他自戕前瀕臨瘋狂的祕密？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梵谷

美國聖人林肯每個星期服用一次含水銀的藍色藥丸？

狂人希特勒之獨裁大業和其隱疾有何關係？

希特勒

王爾德

王爾德、波特萊爾、福樓拜、莫泊桑、喬哀思

這些創造文學風流的大家，因何承受欲死欲仙的苦痛？

福樓拜

莫泊桑

他們是天才、是狂人，他們的死亡是謎，藏著不可告人的……

東華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林耀盛◎導讀

黛博拉·海頓◎著
Deborah Hayden

李振昌◎譯

天才、狂人與死亡之謎／Deborah Hayden 著；

李振昌譯，初版。—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3（民92）

面：公分。（新世紀叢書；128）

譯自：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ISBN 957-0411-84-8（平裝）

1.性病—歷史

415.23709

92016029

天才、狂人與死亡之謎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黛博拉·海頓（Deborah Hayden）

譯者——李振昌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編輯部主編——曾蘭蕙

行銷部主編——許純青

行政專員——林秀玲

行銷專員——劉健偉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62號1樓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網址：http://www.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26號

行銷代理——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排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電腦排版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415.00.001

ISBN 957-0411-84-8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92年10月初版 一刷(1~3,500)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by Deborah Hayden

Copyright © 2003 by Deborah Hayde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90元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人文心靈・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天才、狂人與死亡之謎

POX :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黛博拉・海頓 (Deborah Hayden) ◎著

李振昌◎譯

林耀盛◎導讀

那個綠眼魔鬼跟我開可惡的玩笑，我的健康糟透了。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我們血液裡都有共和的精神，就像我們骨頭裡都有梅毒。我們是民主的，也是梅毒的。

——夏爾·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爛如污泥賤如土，
身心煎熬淚已枯，
一生飽受折磨苦，
末日已近歸塵土。

——法蘭茲·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沒有人一出生就開始墮落。

——居斯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我過的生活真的很危險，我是那種可能爆炸的機器。

——腓特烈·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歷史只是流言蜚語。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導讀〉

掀開潘朵拉盒子之後

——綜覽存有與死亡謎面的一趟航程

東華大學諮商與輔導
學系助理教授

林耀威

在善於鑒別的眼裡

許多瘋狂是非凡的理智，

許多理智才是瘋狂。

這裡是多數佔著優勢，

像在其他場合一樣——

贊同，你是明哲的，

反對——你將滑向危險，

會讓鎖鍊給緊緊捆綁。

——艾蜜莉·狄瑾遜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希望」是對相互支持關係的懇求

希臘神話中，盜火給人類並特意將牲禮最好的部分留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神話人物本身的名字所指涉的意蘊，就是一種「先慮」的隱喻。普羅米修斯未能阻止潘朵拉掀開盒子後，人類禍殃哀愁湧現的衆神報復計謀一一應驗，存活備受威脅，但是，潘朵拉的好奇心卻也巧妙地留下人類唯一的慰藉——希望。

「希望」是克服絕望誘惑的一股身心性靈力量，尤其在人類的生命航程裡，風雨無數，希望是對威脅的一種回應，是對相互支持關係的一種籲請，可以導致目標的設定，而非東張西望的遲疑躊躇。然而，科技新希望，可以解答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謎面嗎？在引介本書之前，先丟出一個問題，梅毒、天才與死亡，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以素樸觀點來看，梅毒是一種遮蔽的、私密的和羞恥的烙印；天才則是一種顯露的、外揚的和驕傲的象徵。不過，無論我們是銜帶著什麼樣的身分或地位，無論是置身受苦處境或享樂天堂，無論是被周遭他者所讚美或所鄙夷，人類終究需面對死亡的終極課題！在我們典雅有序的存有之幽窖裡，仍會不時迴閃著殘酷現實的死亡片影，而我們也會被它深深驚嚇。

從後設的角度來看，歷史上人類死亡因由的謎面，究竟是憑藉著一紙死亡證明書就可逕予解答殆盡，抑或糾葛著人類生活形態、時代社會氛圍和大自然生態圈間的繁複演化與

消長關係，必須仔細推敲深深。當我們宣稱科技昌明，人類存有密碼的最終機密檔案的解碼魔術數字逐漸歸零，永恆的希望之燈點亮了，我們認定當代社會已經可以和不同的病毒菌種競爭以取得生存的支配權之際，其實，人類卻始終籠罩著可能遭致毀滅的陰影。別的不提，就如同梅毒在我們的自然界已經存活超過五百年，儘管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療法問世，病毒所引發的疾病至今仍威脅著人類；而今年來勢洶洶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彷彿是一場中世紀瘟疫災難的降世，考驗人類的群界系統——若說這是一場瘟疫，這更是人類心靈上的瘟疫浩劫，因為 SARS 的衝擊，仍然是折射著人類、社會和自然間際的倫理關係失衡的一種反撲意義。如果我們重新省思梅毒（或其他病毒，及其所衍發的心身併發症）和受害者（尤其是知名人物們）的關連效應，是使我們得以在痛苦中學習逆向思考，在不安的思緒裡懂得謙卑，那麼，梅毒、天才和死亡的相互盤錯性，就不會只是撐開「遮」與「掀」、「公」與「私」或「榮譽」與「恥辱」的二元對立論而已！

「污名」的印刻是心靈上的芒刺

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曾經分殊化三種污名化的類型，「身體的憎恨」（abominations of the body），各種的身體殘疾或變形；「性格的瑕疵」（blemish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如意志薄弱、縱情、不誠實、瞞騙，主要從既有的類疇推論，像心智失常者、酗酒者、梅毒者經常背負著敗德的或罪愆的傾性）；以及源自於種族、國族和宗教上的「部族上的污名」（tribal of stigma）。就梅毒罹患者而言，病毒在不同發作階段對身體功能和外觀上的負面影響作用，造成一種惡之負擔；以及梅毒罹患者所隱含的道德恐慌和個性污點；乃至於梅毒在五百年前入侵歐洲所帶來的不僅是健康問題，更帶來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和精神上的震盪，由此觀之，梅毒可說是兼具高夫曼所指涉的「三重污名化」（身體、性格和國族）於一身，是人際關係裡不被正面肯認的一項頑疾，無怪乎精神分析家榮格在描述尼采的疾苦病痛時，用「黑暗中的毒藥」來形容梅毒。然而，梅毒的時代意義，難道僅在於證成一種被他者所賤斥的疾病污名化現象嗎？

當然，並非如此。

在這 SARS 入秋後可能捲土重來的警訊裡，獨立學者黛博拉·海頓新書《天才、狂人與死亡之謎》中譯本的發行，別具意義。這般的意義指向，並非在於藉由讀者獵奇八卦的心理收受作用，以猛挖已故名人瘡疤的姿態炒作本書，在訊息內爆的台灣社會已經受夠了如此缺乏深度反省的窺視現象。暫且不論自從歐洲和美洲在歷史上交會後，這五百年以來，梅毒究竟是否為美洲對歐洲的一種惡意復仇的「答謝禮物」，迄今仍然是一項爭議；直接回到海頓的《天才、狂人與死亡之謎》一書脈絡，可以反折出考察疾病、文化和死亡間交叉紐結的一面鏡像。本書共分成四部，第一部敘事梅毒的歷史，涵及梅毒的診斷、病

程、治療方式和社會含意。第二部剖解十九世紀知名人物的死亡之謎，證據指向其死因和梅毒的關係。第三部則選取二十世紀的三位人物（布里森、喬哀思、希特勒），同樣考察其死因可能和梅毒這隱諱不為人知的疾病有所關連。第四部則為梅毒走廊，讀解梅毒的迷思和意涵。

綜言之，本書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以希特勒為終曲，一路剖析西方近代（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歷史文化上具深遠影響力的知名藝術家、音樂家、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政治家，乃至於獨裁者的死因和梅毒的關係。海頓在本書的中心問題意識為「在知名的、具影響力的歷史人物裡，誰染有梅毒，以及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開始罹病？」在每個人物檔案裡，海頓條理式地羅列、陳述傳染上梅毒的證據及其後果，同時追索著「這些知名人物的傳記書寫者，究竟是如何處理這些死因證據，或者錯失遺漏線索，或者乾脆就直接忽略這些證據？」傳記書寫者或歷史檔案裡，無論是直接面對證據或置之不理或存而不論，背後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理由。從為了個人審慎理由到基於國家安全，罹患者或作傳者都會試圖掩飾死亡的真正致命原因，理由不一而定。然而，從醫生的疑似病例檔案裡抽絲剝繭推論，或者取材於新近科技的遺體毛髮檢驗報告，乃至從生平傳記的真偽辨識與書寫者因應策略的分析（保守秘密、診斷出罹患梅毒、忽略或遺失），海頓在本書從不同的角度和證據來源，嘗試回答一段文化社會上沈默的，或被遺落的名人生平史。因此，仔細閱讀省察本書所揭顯出來的過往未被言說的訊息（即使仍不夠

完整），方能對沈默的歷史有所應答；若讀者閱讀本書時，流於形成「分裂的心靈」狀態，一味製造「相信」或「不信」作者所鋪述的死因證據的兩造緊張關係，蔚為捍衛本書的基本教義派或嗤之以鼻的敵對陣營；或者將本書淪落於一種八卦消費的閱讀心態，以管窺知名人物的私密空間為樂；或者以私家偵探式的解讀（解毒）方式閱讀本書，只著眼於後果的真假論斷，忽視考察死亡線索背後所負載的社會廣度和文化深度，如此，恐將稀釋本書的出版發行價值。

在死因證據的論斷上，作者所列出的知名人物死因之謎是否為梅毒，仍未能全然蓋棺論定，何況，就邏輯上來說，「欠缺的顯相」（proof of absence）並不等於「證明了空無」（absence of proof）。同樣地，就算是可以蒐集到正向的證據，有可能是具備強力的背書，也可能僅是微弱的支持。是故，如何跳脫「全」或「無」（all or none）的認知陷阱，以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心智生態場域閱讀本書，似乎更可以接近本書的發聲頻道，從而具體接收感通到作者的書寫旨趣，這是讀者閱讀本書時，得以隨時回頭自我提醒思考的課題。

人類存有本身就是一種「秘思」

事實上，「梅毒」又稱為「偉大的模仿者」，正因為梅毒善於模仿與變形，真相不易查明，所以，「偉大的模仿」其實也意味著「巨大的秘密」。雖然，在罹患梅毒初期，個

體尚未產生痼呆性麻痺之際，梅毒發作時會對個體產生一些酬賞作用，例如個體會產造異樣的欣快感，激發出源源不絕的創造能量，或者形構肯定的自大狂戀感，但這是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代價未免過高。因為梅毒既然是模仿者，長期下來所積累的公共與私密壓力的雙重交疊效應，對個體的生活產生苦痛，甚至在梅毒罹患後期，個體還會產生類似「心智失常」(mental disorder)的現象。在此境況下，梅毒似乎找到了脫困的替身，不過，從梅毒到心智失常，其實只是換了一頂污名化的帽子，面對人類的疾病纏身，人類存有的謎面似乎仍然無法找到航向真理的偉岸。

一般來說，心智失常的起源有兩派說法，一種為生理上的違常所導致，稱為麻痺性痼呆(general paresis)，例如因感染梅毒導致腦功能受損、肢體麻痺和認知改變，而產生心智喪失現象；一派為心因說的論點(psychogenesis)，認為尚未解決的心理上的困擾或生活上的難題，導致心智違反常態的現象。因此，梅毒發作會產生疑似精神疾病狀態，並非什麼新發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閱讀本書可以進一步思考，梅毒既為「偉大的模仿者」，就隱含著引致這些身心症狀或徵候的起因，就無法單一歸因於梅毒。因此，尚待回答的問題是，諸如「為什麼同樣罹患梅毒（如果死因確是如此），貝多芬就可以從中『受惠』，進而譜創出不朽的名曲」；而「希特勒卻淪為滅種的血腥劊子手？」顯然，將藝術才情的揮灑或哲思智慧的凝練，僅是單純地歸因於罹患梅毒的後遺效應，如果不是一種「危險的措辭」，至少也積澱出將梅毒「過度浪漫化」的模糊描寫策略，相信這也不會是

作者出版此書的本意。

因此，閱讀本書，更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在受苦困頓狀態下，是什麼樣的力量影響著這些知名人物的作品、言論及舉止的呈現風格和生活形態；同時，藉由本書的指路，我們更可以深刻地了解到除了徵之事實、訴之證據的生平傳記及史料考證外，人類和大自然的生態其實是形構著一種脆弱的鍵結關係，只有以互信互助互諒的共生關係面對我們的生活「世界」，才能繼續生存斯世。這裡所謂世界，不是我們思考的對象，而是我們貫串生活的地方，這是涵蘊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與歷史的動力的生活世界。同樣地，從本書所列舉的各個人物檔案省察，也將我們推向面對「科學化的吊詭」的議題，意即物理化學機制與數學模型能使我們日趨精微縝密地理解諸如細胞或分子的現象，然而，生命與死亡，以及疾病、畸形、異常、偏差，就其自身而言並非物理化學的科學問題，而是關於價值、心理、社會與政治的問題。

一點後話

回到本書的文化蘊義而言，後現代的醫學關照採取生物文化（biocultural）的雙重編碼（double coding）論述，亦即從生物的與文化的糾結力量反思醫學疾苦病痛，受苦不只是對疾病入侵的反應，更是關涉著對全人（the whole person）的威脅。其實，從臨床上的醫病相

逢來看，文化的差異大致體現於：(1)因為語言、非語文風格、禮儀符碼、默會之知與生活根本預設的差異，造成雙方互為了解的困難。(2)醫療人員對病人的古怪信念或生活實踐的誤識。(3)價值上的差異。因此，在生病事實的立場，轉向多重實在性(multiple realities)，並重視局部的／在地的實在性，成為重要課題。只是，在文化均質化的普遍論暗影的封喉下，所謂「精神病患」／「梅毒患者」／「心智違常者」(或其他被污名烙印的弱勢家族們)的聲音影像，及其對時代影響的歷史效應，總是被生物醫療論述所消音或消磁，往往成為文化的化外之客體，凝視的盲點之殘跡罷了！

究其實，就演化的敘事機制而言，身體是可以記得受苦，而恐懼的命名就是這種受苦記憶的具現。恐懼的反映，如同疾苦病痛，是人類演化歷程裡的禮物，使得有機體可以預期危險、避免毀滅；而沒有能力去感受、記得並聆聽疾苦病痛，是一種無知的危險，可能導致「後創傷」(post-traumatic)經驗的呈現。從閱讀本書到對照著SARS的侵擾，使我們感知若個體無法從受創經驗中成長學習，將形成一種後創傷現象，若此個體就會為苦痛和恐懼所殖民化，生活世界將掉落於受苦空間，受創經驗的影響層面將更廣泛、更持續，這是值得吾輩憬察的環節。

期待本書的中譯本發行，多少可以發揮社會作用，促發我們重新思考疾病意義，並開啓探究疾病意義領域的榮景；同時，也祝禱本書得以激發讀者深切體悟生命和死亡在每一次交錯而過的步履痕跡裡，其實都在揭示著一則則我們尚待學習的終生功課！

〈前言〉／黛博拉·海頓

天才、狂人與梅毒之謎

一八八二年，莎樂美（Lou Andreas Salomé）二十一歲，這年夏天她跟尼采曾經交往密切。

一九一一年，她加入弗洛伊德的小組時，帶著跟尼采交往的許多軼事。尼采告訴她一些秘密，是形成尼采哲學後期許多驚人的內幕。弗洛伊德與他的追隨者（包括榮格，當時跟弗洛伊德的關係還很好）對尼采的生活非常感興趣，包括梅毒對他的哲學是否產生影響。①

一九〇二年，柏林的神經系統精神病學家摩比斯（P.J. Möbius）第一次揭露尼采的診斷書。上面寫著，早在一八八一年，尼采遇到莎樂美的前一年，就已經表現出因為梅毒所引起的興奮，這是梅毒末期瘋狂的前兆。弗洛伊德的小組既然知道這事，一定會質問莎樂美有關尼采當時的心理狀態。但是，她堅決認為，談論尼采是逾越界線。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我閱讀莎樂美與尼采的故事，總共有十幾個版本，發現沒有人確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年夏天，他們在理智上的關係相當密切，幾個月之後，尼采又滿懷敵意地批評她：

如果我現在拒絕你，就是完全譴責你。這把劍掛在你的上頭。根據有些人的看法，尼采向莎樂美求婚被拒，整個人都崩潰了。有些人說，尼采跟隨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是拜魯特（Bayreuth）同性戀圈子的人，莎樂美對於散播鷄姦的謠言，感到有罪惡感。也許是她編造求婚的事情。在探索這件事情之後，我發表了一篇文章〈尼采的秘密〉（Nietzsche's Secrets）②，討論有關尼采傳說的矛盾之處。但是梅毒的問題，以及梅毒在一八八二年夏天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使我十分困惑。

尼采染上梅毒的反應是什麼——假設他知道的話？尼采說，莎樂美跟他們的朋友保羅·黎（Paul Rée），是他唯一可以講真心話的兩位知己。那他有沒有將梅毒這件秘密透露給莎樂美呢？許多學者認為，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尼采於杜林的廣場崩潰發瘋之前，梅毒完全沒有影響尼采。這跟摩比斯的診斷書正好相反，真是如此嗎？尼采的疾病相當傳奇，他曾經因為偏頭痛與胃腸的疾病，一年內躺在病床上二百一十八天。他自己承認，他等於八分之七的盲人。我很好奇的是，他的身體狀況是不是因為梅毒造成的？尼采時代對於梅毒的認識有多少？當時的醫生能夠預先告知他什麼？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關於梅毒的醫學書籍，插圖極其豐富，文字淺顯，顯然是給門外漢看的。閱讀這些舊書，我看到尼采一八七九年從巴賽爾大學（Basel University）請病假開始，歷經十年極其痛苦的煎熬，而這正是典型的梅毒發病過程。大家都知道他對自己的健康有深刻反省，也知道他經常難以忍受這痛苦，從他非凡的信件與出版書籍中可以深刻

感受到，這些能否證明此疾病逼得他發瘋？

奧圖·艾瑟（Otto Eisner）是尼采的醫生，尼采寫信給他說：「我的存在是可怕的負擔。如果我沒有做那些很具啓發性的心理與精神的測試和實驗，以這種痛苦的狀況，我幾乎要完全宣告放棄……整體而言，我比以前快樂。只不過還是很痛苦，一天有好幾小時覺得像在暈船，半癱瘓的狀態下很難說話，然後是猛烈的發作。」③

我想知道同樣的模式是否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因此我翻閱法國三位曾經罹患梅毒的名作家傳記，分別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他們都遭受多年的痛苦，而且長期以來一再舊病復發，曾經找梅毒專家以水銀治療，不過很少提到這些痛苦與梅毒有關，甚至完全沒有提到梅毒這回事。從尼采與這三位法國作家，我開始探索其他已知罹患或疑似罹患梅毒的人。

我的發現令人訝異。十九世紀後期，梅毒專家艾佛瑞·傅立葉（Alfred Fournier）估計，巴黎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感染梅毒。不過，無論是在回憶錄或是傳記，很少人做這方面的敘述，得過梅毒的人也很少寫下他們的親身經驗。梅毒是生活中不可告人的秘密，診斷結果只能偷偷告訴最親密的友人，以保秘密不會外洩。這種事情羞於告人，所以日記上不會記載，通信時以密語拐彎抹角地提到。我很好奇，十九世紀的傳記文學行文間有多少是隱含著梅毒的意思？

一九〇七年，小說家史達方·褚威格（Stefan Zweig）指出，維也納在二十世紀初，每十